

自雇者与受雇者的社会资本 差异研究*

邹宇春 敖丹

提要: 研究社会资本在地位获得模型中的地位和作用时有两个难点必须理清。一是社会资本的概念和测量问题,二是劳动力市场内的不同就业状态(例如自雇与受雇)是否会对不同方法测量到的当前社会资本的生成产生影响。这对于全面理解社会资本理论以及社会资本在地位获得模型中的作用非常重要。本研究论证了当前几类社会资本测量工具在设计原理和测量功能上存在不同,研究者可根据研究目的和测量情境来设计和使用恰当的测量工具。本研究使用2009年中国大城市社会网与求职调查中的广州数据,应用多个回归模型分析了通过三种方法测量到的“讨论网”社会资本、“拜年网”社会资本和“饭局网”社会资本在自雇者与受雇者两个群体间的差异。研究发现,首先,自雇者与受雇者的“讨论网”社会资本不存在差异;其次,相对于受雇者,自雇者更主动地去投资并拥有更多的“拜年网”社会资本和“饭局网”社会资本。

关键词: 社会资本 劳动力市场 自雇者 受雇者

社会资本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在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Granovetter, 1973; Lin, 1999)。作为嵌入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社会资源,社会资本在个人或组织有目的的行动或情感健康维系活动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Lin, 2001; 梁玉成, 2010)。正因为此,劳动力市场研究常常把社会资本对劳动力市场分割、就业感受、工作变迁等的影响作为研究重点。相比之下,社会资本的生成差异研究显得相对薄弱(Lin et al., 2009)。

特别地,在劳动力市场领域内,个体职业地位获得是一个系统而动态的过程,林南(Lin, 1999)等将社会资本作为中介变量加入了布劳和

* 本论文使用数据全部来自“2009年中国大城市社会网与求职调查”之广州数据部分。作者感谢中山大学城市社会研究中心蔡禾教授及其他工作人员提供的数据协助,本论文的观点和内容责任由作者自负。此外,在匿名评审老师的建议下,本文结构做了部分调整,在此也深表感谢。

邓肯的地位获得模型 来考察社会资本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回报 ,为分析地位获得过程提供了更有效的视角。遗憾的是 ,此模型对于社会资本生成受到哪些因素影响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在此背景下 ,本研究着重探讨不同的就业状态(如自雇与受雇于他人)是否会对个体当前的社会资本的生成产生影响。作为不同于受雇者的劳动力 ,自雇者的人数在显著增加(Barbieri ,2003) 。他们不仅改变了劳动力市场结构 ,甚至改变了整个经济、社会结构以及相关社会政策。虽然有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存在职业差异(Ajrouch et al. ,2005) ,但自雇的就业状态是否会生成不同于受雇状态的社会资本尚缺乏经验数据证明 ,尤其不清楚的是 ,在控制了其他重要的要素(如社会经济地位)后 ,不同职业状态对当前的不同维度的社会资本生成会产生何种不同的影响。

此外 ,“社会资本”的概念和测量起源于西方 ,社会关系网络构建的文化背景不同于东方国家 ,比如中国。如何理解社会资本 ,如何运用相关测量工具做本土化调适 ,对分析社会资本的生成以及有效地测量社会资本都显得非常有必要。

因此 ,本研究主要探讨两个问题 ,一是“社会资本”测量工具比较以及中国本土化问题 ,二是考察劳动力市场内当前不同维度的社会资本生成是否受到就业状态(自雇与受雇)的影响。接下来 ,本文将先陈述相关理论背景和研究假设 ,接着解释数据、方法并分析研究结果 ,最后 ,对研究结果做进一步讨论。

一、社会资本的概念

由于研究视角和关注重点的不同 ,“社会资本”概念尚未统一 ,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直接将社会关系网络特征当成社会资本来研究(Burt ,1995; Erickson ,1996; Putnam ,2000) 。这种观点认为社会网络的各种不同特性直接对行动者的行为产生影响 ,比如 封闭性(closure) 网络的社区有利于子女教育(Coleman ,1986) 。但实际上 ,此网络特征并非自动发挥作用 ,而是通过激发或限制个体使用嵌入在这些网络内的资源而发挥作用。封闭网络的社区为孩子的父母提供了交流孩子学习信息、监督孩子学习行为的机会(Chung ,2008) ,但并不是这种网络特征本身促进了孩子教育 ,而是父母之间有关孩子教育信息的交流促

进了父母对孩子的监督。科尔曼得到封闭网络特性有利于子女教育的结论有个先在假设,即父母之间愿意就子女教育相互交流。一旦某个封闭社区内的父母不重视教育,科尔曼的结论就有可能不成立。可以说,此网络视角下的社会资本概念主要强调网络特征,但真正对个人行为和生活起作用的是社会网络内所承载的资源。

相比而言,另一种有关社会资本是网络社会资源的概念显得更具吸引力。有学者(Bourdieu, 1986; Volker & Flap, 2003; Lin, 2001; Portes, 1998)提出,社会资本是嵌入在社会网络中、可由行为者获得并且借用的社会资源。这种社会资源视角下的社会资本不能独立于社会网络存在,前者是内容,后者是载体。社会资本的使用是个体动员并借用构成网络的其他人的资源以完成个体的工具性行为或表意性行为^①的过程。社会资本只能为行为者所用,但不为行为者所有。因此,要全面理解社会资本,有必要同时关注社会网络特征和嵌入在网络内的资源(Bourdieu, 1986),同时更强调真正对行为者发挥作用的是嵌入在社会网络内的社会资源。而在实证研究中,社会资本的测量指标既要包括社会网络特征,也要包含嵌入在网络内的资源的数量和质量。

二、社会资本的测量理念和指标

(一) 测量理念

社会关系网络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要求测量指标有所不同。在不同的文化情境下,社会行动者的网络构建方式和互动模式各有差异。因此,即便在本研究采用的概念框架下,根据不同的研究背景,社会资本测量的操作化也会略有不同。目前,常用的“社会资本”测量工具有两种。一是定名法(name generator),二是定位法(position generator)。

定名法在设计之初主要是用来测量社会网络的特征,由劳曼(Edward O. Laumann),威尔曼(Barry Wellman)和弗雪(Claude S. Fischer)等最先提出(Lin et al., 2001)。研究者通过设定某个情境(比如生病、借钱、遇到难题等)让受访者回忆遇到该情境时会向谁求助或与

^① 工具性行为是指为实现新目标、获得新资源而采取的行动,具有很强的功利性;表意性行为是指为维持现有资源而采取的行动(Lin, 2001)。

谁讨论,并请受访者列出这些人的名字,再辅以一系列后续相关问题(如网络内成员的交往强度、网络成员年龄、教育、职业、职称等信息)以采集更多信息。在这些信息的基础上,研究者可以通过构建不同的网络指标来了解个体社会资本情况。目前,最常用的定名法是让个体列出在其遇到重要问题时会去找哪些人咨询或讨论。这个情境下的定名法所测量到的社会网络被称为“讨论网”。

定位法由林南和杜明(Lin & Dumin, 1986)提出。从社会网络资源视角出发,他们认为,通过设定具体情境来测量某几个网络成员的方式来测量个体社会网络内的社会资源,并不能完全反映个体网络内的社会资源量。鉴于社会职业地位是当代社会对应不同社会资源的有效维度^①,他们设计了定位法测量工具。通过测量个体社会网络内各成员的职业分布,构建并测量出个体的职业网特征,获取网内资源信息(罗家德, 2005)。这个方法要求受访者在一份按职业得分排好序的、能代表不同层次社会资源的职业列表中选择自己是否有认识的人从事这个职业,并询问这些人的年龄、关系类型、职位等情况,得到的网络可称之为职业网。由于在中国“新春拜年”为个体提供了一个重现、维护,以及扩展社会网络的最佳时机,给多少人拜年、给什么职业和职位的人拜年能很好地反映中国社会里个体的网络关系和社会资源存量。因此,边燕杰等(Bian & Li, 2005)提出,在中国测量“职业网”时,可将其置于“新春拜年”的本土情境下,对研究中国社会将更为有效和真实。可见,社会资源视角下的社会资本概念并没有否认原有的社会资本测量工具(即定名法),也没有否认社会网络特征的测量指标,但强调这些测量工具和指标的资源指向,并发展出定位法这个新的测量工具。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两种测量方法在设计理念上存在不同,两种方法测得的网络构成和嵌入资源所能实现的功能也有所不同(Lin, 2005)。定名法测得的网络多由亲密朋友、亲属、关系较强的他者组成。它以测量“强关系”为主,较少能测量到“弱关系”。网络成员的交往度和熟悉度都较高,拥有资源的相似性也要高于弱关系。这些较同

① 设计此方法的前提假定是,社会结构呈等级制,不同的社会位置对应不同的等级以及相应的资源。而当代社会中,职业是衡量社会位置的一个指标,职业声望对应着不同等级的资源量。

质的资源给个体提供了一种相对熟悉、稳定的环境,有利于个体实现维持原有资源、获得心理支持等表意性活动(Lee et al. 2005)。相比之下,定位法根据职业声望得分设置的职业列表代表了当前社会的大部分职业,覆盖当前社会大部分的资源,测得的网络由亲属、朋友、一般认识的人等组成,包括“强关系”和“弱关系”,可给个体提供不重复信息、不同层次和不同领域(教育、法律、技术等)的较异质的资源和影响力,有利于个体实现工具性行为、完成新目标。

此外,在将“社会资本”测量工具做中国本土化调适时,需要考虑中国有一种异于西方且对社会网络建构起了非常重要影响的文化,即饮食文化。饮食本是维持日常生活的个体行为,但在中国情境下它已成为一种社会互动,并在多数工具性行为的达成中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换句话说,在中国,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组织与组织之间的交流有时在饮食过程中才可完成得更顺畅。随之产生的“饭局网”^①内亲属关系出现的比例比核心网低,而非家庭成员和工作伙伴出现的频率较高,且网络成员的稳定性低于“讨论网”和“拜年网”(边燕杰等,2004)。社会个体可通过社交餐饮活动拉近情感距离,维持旧的或投资新的社会资源。因此,饮食吃饭生成的网络是工具性导向的社会网络(张文宏等,2004)。本研究认为其内嵌的社会资源性质不同于“讨论网”,但可能与“拜年网”部分相似。

(二) 测量指标

最早有关讨论网的指标主要有七个,由麦斯登(Marsden,1987)设计并沿用至今:(1)网络规模(size),代表网络的大小;(2)亲属成员数量(kin),即网络内亲属的数量;(3)交往密度(density)是成员间熟悉程度的均值;(4)年龄异质性(age heterogeneity),即为年龄连续变量的标准差(SD);(5)教育异质性(educational heterogeneity),为教育年限连续变量的标准差;(6)性别异质性(sex heterogeneity),可用质性变异

① 饭局网,是指通过“饭局”的方式联接起来的社会网络,这种网络可以维护旧有的并投资新的社会资源。有些文章将此网络称为“餐饮网”,如张文宏等(2004);边燕杰等(2004)。本文称其为“饭局网”,意在强调此网的功能,不在“饭”而在“局”。它强烈具有工具性导向的特点。

指标(IQV, Index of qualitative variation)^①得到;(7)种族异质性(race heterogeneity),也用质性变异指标得到。虽然这些指标设计之初是网络特征视角,但从麦斯登在文章中对各指标的解释可发现,这些指标虽然测量的是网络特征,但也同时反映了网络内嵌的资源。比如,他指出,密度指标反映了个体所能获得的社会支持和社会福利(资源),亲属成员数表明个体从网络里获得的资源是否来自亲属。他还指出,其他四个异质性指标的程度越高,则表明个体的网络越具有多样性,并表明个体可获得的资源(如信息)就越多。林南(Lin, 2001)也指出,这些社会资本指标被建构出来,其实是为了反映交往者资源的异质性和范围。

定位法测量工具在中国使用时被设置在中国拜年情境下。根据以往研究(Van der Gaag et al., 2008; 赵延东、罗家德 2005),有关职业网社会资本的测量指标主要有三个:(1)网络广度(extensity),即拜年对象所从事的各种职业的数目,测量网络中资源的多样性和异质性;(2)网顶(upper reachability),即拜年对象所从事的各种职业中最高的职业声望得分,测量网络内职业地位最高的人拥有多少资源;(3)网距(range),即职业最高分和职业最低分的差异,测量网络内资源的差距和范围,表明最丰富和最贫乏资源的差异。为更有效地收集职业网信息,拜年网人数、拜年网的构成(亲人数、好朋友数、一般朋友/相识人数)等指标也被建构且用来测量个体的拜年网资源。这些资源统称为“拜年网社会资本”。^②

饭局网社会资本,也是社会资源视角下社会资本的中国本土化测量。结合中国饮食文化的特色,边燕杰等(2004)设计了社交餐饮测量法,并构建了三个相关指标:(1)请人吃饭强度,即询问请人吃饭的频率,可反映出个体建构和维持社会网络及社会资源的主动性;(2)被人请吃饭强度,即询问被人请吃饭的频率,衡量个体自身社会网络资源的丰富程度;(3)陪人吃饭强度,通过询问陪人吃饭的频率得到,可以反

$$IQV = \frac{D}{\frac{K-1}{k}} = \frac{K}{K-1} \left[1 - \sum_{k=1}^k p_k^2 \right] \quad (0 \leq IQV \leq 1)$$

①

$$(D = 1 - p_1^2 - p_2^2 - \dots - p_k^2 = 1 - \sum_{k=1}^k p_k^2)$$

② 这些指标的中文翻译都带有“网”字,易让人误解成是测量网络特征的指标。本文采用之,只是沿袭当前中文文献的译法。

映个体在社会网络中的桥梁作用。

不难发现,测量讨论网社会资本的指标能通过测量社会网络特征来反映内嵌的社会资本。而围绕后两个测量方法所建构的指标,都是直接从测量社会资源视角下的社会资本来设计的,因而更明显地表达了测量网络内嵌资源的意旨,是对社会网络内嵌资源的直接测量。

三、就业与社会资本

有关就业和社会网络(及其资源)关系的研究从格兰诺维特开始就备受关注。研究表明,对于同一个体而言,刚进入劳动力市场(如寻找第一份工作)时他/她曾投资构建的社会资本会在找工作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① 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 1973)研究发现,在就业市场中,社会网络发挥了显著作用:使用社会网络能帮助找到更好、更满意的工作。“弱关系”作为连接不同社会群体的桥梁,能带给找工作者新的、不重复的工作信息。林南等(Lin et al., 1978)进一步提出,找工作过程中动用的社会关系及其提供的资源可以帮助个体获得更好的社会地位。其次,个体在进入劳动力市场后,研究发现其工作或生活仍旧受到社会资本不平等/差异的影响。伯特(Burt, 1998)指出,嵌入在职业精英网络中的男性更容易获得职业升迁。相对自己应聘进入公司的员工,通过熟人介绍来的员工具有更强的稳定性,对公司归属感也更强(Fernandez et al., 2000)。个体的收入会影响他们对自己健康的评价,但这种自我健康评价受到社会资本的调节(Veenstra, 2000)。

可见,当前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个体的社会资本在劳动力市场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社会资本理论指出,社会资本研究应包含两个过程:一是社会资本的生成(creation),二是社会资本的回报(returns)(Lin, 2001; Volker & Flap, 2003)。前者是行动者有意识或者无意地把社会资源当作资本来“投资”的过程,后者是行动者动用和使用这些社会资源以实现某个目标的过程。遗憾的是,当前研究较多集中在社会资本的回报过程(即社会资本对就业的影响上),对社会资本的获

^① 有文章(如林南、敖丹, 2010)已经论证,个体在找工作的过程中,无论是否主动向网络中的他者寻求帮助,社会资本都会显性或者隐性地发挥作用。

取/生成的研究显得相对薄弱(Lin et al., 2009)。

布劳和邓肯的地位获得模型(Blau & Duncan, 1967)对了解劳动力市场具有深远的影响。此模型强调个人地位的获得,除了直接或间接受到父亲职业和父亲教育等先赋资源的影响,更多是受到个人前一份职业情况和自身教育水平的影响。此模型表明,进入劳动力市场后,个体会经历身份、职业活动等方面的转变,并影响下一次的职业获得。这意味着,进入劳动力市场后的个体的社会资本投资/生成可能会受到自身转变所带来的新因素的影响。尽管此模型只有约24%解释力度,但为认识劳动力市场的职业流动机制提供了很好的理论视角。此后,在对这个模型的修正和扩展中,研究传统开始关注社会资本对地位获得的影响。此传统的基本命题是,与个人资源相比,社会资本对地位获得的影响会重要很多(Lin, 2001)。林南(Lin, 1999)在对布劳和邓肯模型进行补充分析时,将社会资本因素作为中介变量引入了模型,大大提高了模型的解释力。模型中,作为中介变量的社会资本,受到个体的教育、个体以前的职业地位等两个因素的影响。此模型更进一步说明,进入劳动力市场后,个体的社会资本生成会受到职业经历等劳动力市场内生因素的影响。基于这两个模型,我们有理由假设,嵌入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资源并非完全外生于劳动力市场,它的生成会受到与个体有关联的劳动力市场特征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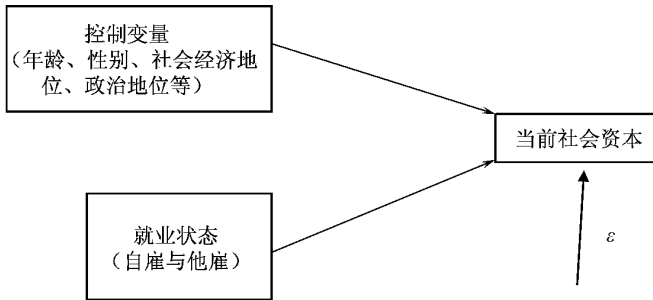
因此,除去人口学因素,个体在劳动力市场内的就业状态、收入、职业差异等等劳动力市场特征都很可能造成社会资本在质和量上的差别,进而影响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达成下一步行动。林南(Lin, 2001)的研究表明,在劳动力市场中,社会个体所拥有的社会网络及内嵌的社会资源,不仅会受到个人的年龄、性别、初始位置影响,还会受到工龄或任期、工作部门等因素的影响。职业对社会网络的影响在个人的后半生尤为明显(Ajrouch et al., 2005)。相比那些教育水平低、失业或者从事收入很低或没有技术含量的职业的人,受过良好教育并且拥有专业化职业的人拥有极其不同的社会网络。这些不同的网络蕴藏着不同的资源,对行动个体产生不同的影响(Stoneman & Anderson, 2006)。可见,为数不多的社会资本生成研究表明,一些自进入劳动力市场后才获得的职业特征会影响社会资本的再生成,造成社会资本的不平等,进而影响社会结构。那么,不同的就业状态(自雇和受雇),作为个体进入劳动力市场后拥有的最明显特征之一,是否影响劳动力市场内的社

会资本生成,尚未有经验研究给予回答。

随着经济发展,自雇人群在传统和新型经济领域的作用不容忽视,并且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仍呈增长趋势(Boyd, 2005)。无论技术高低,大部分自雇者提供的消费式服务给他们带来了很高频率的人际互动。关系资源、社会技巧、认知过程以及受到其他重要专业人士关注等特点都使得自雇不同于其他就业形式(Barbieri, 2003)。有研究认为,自雇者只是看起来具有资本独立性,但实际的社会地位和工作环境还不如具有固定薪水和工作时限的雇员(Muehlberger, 2001)。但是,也有研究发现自雇的就业形式让自雇者有更多自主性、弹性、技巧使用以及更强工作安全感(Hundley, 2001),并且纯科技型企业企业家更倾向于建构有关交换的信息渠道,非科技型企业企业家在扩张性社会网络及资源的建构上会花更多时间(Liao & Welsch, 2003)。

在中国,与自雇者社会资本相关的研究多集中在企业家社会资本的测量及效用评价方面。边燕杰和丘海雄(2000)在构建企业社会资本测量时,通过测量企业家的社会资本来获得企业的社会资本。他们发现,结构约束和企业家的能动性(即企业的不同性质以及企业家本身的个体特质)会影响企业社会资本的生成。相比新生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在产权结构约束下缺乏投资社会资本的动机和条件;企业家的教育程度和行政级别对社会资本生成有很强的显著性。有关企业家社会资本的研究还有郭毅和朱熹(2002)、马丽媛(2010)等。此外,也有学者从阶层地位的视角出发,谈到雇主、小雇主等城市居民的社会资本情况,比如边燕杰(2004)按产权、管理权和专业技能将中国城市居民分为行政领导、经理、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技术工人、雇主、自雇者和非技术工人8个阶层,发现自雇者的社会资本总量很低;张文宏等(2004)将城市居民分为专业行政管理人员、小雇主、普通白领和工人4个阶层,比较了小雇主和其他几个阶层的讨论网社会资本。但这类研究存在两大不足:(1)没有很好地区分研究对象是自雇还是受雇;(2)仅仅考察了某一个测量工具(如定位法或者定名法)测量到的社会资本,而没有全面考察个人所拥有的社会资本生成情况。

鉴于此,为更好地了解社会资本在地位获得模型中的中介作用,本研究以中国数据为例,补充分析就业状态对当前社会资本生成的影响,分析两种不同就业状态是否会影响当前不同维度的社会资本在劳动力市场内的生成,以及这些影响存在何种差异。模型如图。



四、研究假设

从前文对不同维度社会资本的讨论可知,不同类型的测量工具可以测量到不同维度的社会资本。嵌入在不同类型社会网络中的社会资源在功能上各有侧重。定名法测量到的“讨论网”主要由强关系组成,其涵盖的社会资源具有较高的同质性,有利于维持现有的资源,从而实现情感倾诉/分享、心情调节、心理支持等表意性行为。定位法测量到的“拜年网”成员由强弱关系组成,其承载的社会资源具有较高的异质性,能够提供范围广、性质不同、功能相异的新信息、影响力或其他新资源,有利于实现工具性行为。而饭局网则是直接通过饮食活动构建出来的社会网络,除了维系原有网络,更多是以开拓新的网络关系或使用网络资源为目的,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其内嵌的社会资源以工具性导向为主要特点(Lee et al. ,2005)。鉴于构成讨论网络的人与行动者的关系比较密切,流动性不大,且其被需求程度不会因为个体的就业状态而改变,本研究认为两种就业状态在讨论网社会资本的构建上不会有显著差异。不过,自雇和受雇是两种不同的就业形式,自雇者和受雇者的行为目的和方式会存在差异。研究表明,选择自雇就业状态的人具有强烈的追逐利益回报的行为动机(Taylor ,1996)。而且自雇者比受雇者可以更灵活地安排自己的时间而且有更多收入(Carrington et al. ,1996)。作为自身事业的首要承担人,自雇者的行为会比受雇者具有更多的功利性导向,自雇者更倾向去构建和开拓更多的工具性社会网络关系。加之社会资本的生产预设了对社交活动的投入(Bourdieu ,1986)。因此,本文假设自雇者与受雇者具有不同的拜年网社会资本

和饭局网社会资本,且自雇者的工具性社会资本比受雇者更丰富。

假设 1: 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受雇和自雇身份不会对“讨论网”社会资本的生成产生显著影响。

假设 2: 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与受雇者相比,自雇者倾向于拥有更多的“拜年网”社会资本。

假设 3: 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与受雇者相比,自雇者倾向于在构建和获取“饭局网”社会资本上投入更多。

五、数据和变量

本研究采用边燕杰教授 2009 年主持的“中国大城市社会网与求职调查”(JSNET 2009)中的广州数据。整个数据库按照多层次模型的要求,在全国抽取八个城市(具体数据信息参见梁玉成,2010)。广州地区共抽取 48 个居委会,有 1038 位 18-69 岁有过非农工作经历的居民参与此调查,有效问卷 1033 份。

本研究的“社会资本”概念是指嵌入在个体社会网络中且能被个体借用的社会资源。就业状态包括自雇和受雇两类。其中,相对于受雇,自雇指非农业生产部门的自我支付劳动报酬的所有形式。本研究的因变量是当前的三个维度的社会资本:讨论网社会资本、拜年网社会资本、饭局网社会资本。本研究认为它们有性质和功能上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在生成过程中也应有所体现。因此,本研究以这三类社会资本的指标作为因变量分别建模。分析软件为 Stata 11.0。

有关讨论网社会资本的测量问题是“当您在个人生活中遇到某些问题(例如工作、家庭、感情等方面的问题),需要找人商量,您首先考虑的五个人是谁?他们的情况怎样?”除去种族异质性,本文采用了六个指标:网络规模、亲属成员数、密度、年龄异质性、教育异质性、性别异质性。网络规模即受访者回答的讨论网人数。亲属成员数等于网络内的亲属人数。密度等于网络成员间的熟悉程度的均值,由于该问题的选择项为:1 = 不认识,2 = 不太熟,3 = 比较熟,4 = 非常熟,5 = 熟极了,参照麦斯登(Marsden, 1987)的做法,本研究将 1-2 设为 0(不熟悉),3 设为 0.5(一般),4-5 设为 1(熟悉)。由于年龄和教育年限都是连续性变量,其异质性可通过对网络成员的年龄、教育年限求标准差

得到。由于性别是定类变量,其异质性通过求质性变异指标获得。^①

拜年网社会资本的测量题器是“在今年春节期间,以各种方式互相拜年、交往的亲属、亲密朋友和其他人大概有多少人?”用这个问题可以构建拜年网人数、拜年网的构成(亲人数、好朋友数、一般朋友/相识人数)等几个指标。同时,在这个问题的基础上追问“他们(春节拜年的人)里面有没有从事下列工作的?”根据职业声望得分构建了下面三个指标:网络广度,即网络成员所涉及到的职业数;网顶,取所涉及职业中的声望最高分;网距,等于职业声望最高分减去职业声望最低分。

此外,饭局网社会资本采用三个相关指标:请人吃饭强度,即请人吃饭的频率;被人请吃饭强度,即被人请吃饭的频率;陪人吃饭强度,即陪人吃饭的频率。本研究把这些指标从原问卷中的五级量表(1=从不,2=很少,3=有时,4=较多,5=经常)转换成三级量表:1-2设为1(很少),3设为2(一般),4-5设为3(经常)。

“是否自雇”为本研究的自变量。自雇和受雇是两种不同就业状态。根据受访者提供的就业状态信息,本研究新建了一个指标:就业状态。自雇者赋值为1,受雇者取值为0。此外,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婚姻状态、是否移民、年龄、政治资本(党员)、社会经济地位指标(SES)和政治地位(干部)。其中,社会经济地位指标是通过对被调查对象教育程度与月均收入两个指标做因子分析(主成分分析法和方差极大旋转法)生成的累计解释变异达69%;政治地位指标由“是否干部”来衡量。

六、研究结果

尽管自雇人数在增加,城市受雇人员比例仍远多于自创业人员。两个群体在性别构成、父亲教育、婚姻状态、是否移民、教育、收入、政治资本和政治地位等特征上存在显著差别(见表1)。从性别比例看,受雇者群体的男性比例小于自创业者,自雇的就业领域内多以男性为主。两种就业状态的群体在父亲教育水平上存在差异,主要体现在受雇者父亲大学及以上的比例比自雇者多了近10%。受雇者群体的已婚人

^① 具体公式见前文脚注。

员比例高出自创业者约 15%。相对于受雇人员,自雇者中以移民居多。说明移民在流入地的主要就业状态是自雇。两种就业状态的群体存在教育水平的显著差异,主要体现在中学和大学及其以上阶段。而两者的收入差异也很明显,自雇者的月均收入高于受雇者 1800 多元。本研究将教育与月均收入两个指标做因子分析合成社会经济地位 (SES) 指标后发现,受雇群体和自雇群体在社会经济地位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P=0.591$)。

表 1 样本特征概要

变量	受雇者(%) (N = 944)	自雇者(%) (N = 89)	差别显著度
性别(1 = 男性)	46.9	62.9	.004***
父亲教育			.141
小学及以下	36.2	43.8	.150
中学	38.2	39.3	.852
大学及以上	25.7	16.9	.064*
婚姻(1 = 已婚)	86.6	71.7	.003***
年龄(岁)	39.4	38.6	.559
移民(1 = 移民)	30.9	53.9	.000***
教育			.000***
小学及以下	4.7	7.9	.187
中学	48.0	67.4	.000***
大学及以上	47.3	24.7	.000***
月均收入(元)	3373	5187	.000***
政治资本(1 = 党员)	18.9	6.7	.004***
政治地位(1 = 干部)	15.6	3.5	.002***

注: * $p < 0.1$, ** $p < 0.05$, *** $p < 0.01$ 。

在中国,党员身份其实是一种个人的政治资本。作为可投资的个人资源,它能为个体带来价值增值的回报(Lin, 2001),但是“自我雇佣者的党员比例非常低”(Yueh, 2009)。本研究结果也表明,自雇群体中的党员比例比受雇者群体的党员比例低了 12.2%。另外,从“是否干部”的政治地位指标也可发现,受雇者比自雇者更容易成为干部。

受雇人群中是干部的比例达到 15.6% ,比自雇群体多了 13.1% 。与自雇人群相比 ,受雇者中有更多人的政治地位较高。

基于以往的文献研究 ,以及两种就业状态的上述特征几乎都具有显著差异 ,本研究把它们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年龄对中 (centering) 后 ,新增二次方变量添加入模型。本文接下来将考察就业状态对三个维度社会资本的影响。

(一) “是否自雇”对讨论网社会资本没有影响 ,即讨论网社会资本在就业状态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讨论网规模”和“亲属成员数”是计数变量 (count variable) ,因其方差和均值相近 ,本研究采用泊松回归 (Poisson regression) 模型进行分析 (两模型拟合优度检验均不显著 ,说明用泊松分布较合理)。表 2 的分析结果显示 ,对于“讨论网规模” ,“是否自雇”未通过单因素 Wald 检验 ($P = 0.358$)。将只包含控制变量模型和加入自变量后模型做“嵌套模型”比较 (谢宇 ,2010) ,似然比检验结果也不显著 ($P = 0.362 > 0.05$)。同样 ,“是否自雇”对“亲属成员数”的影响也不显著 ($P = 0.182$) ,嵌套模型检验也不显著 ($P = 0.188$)。“讨论网规模数”表示行动个体强关系网络内嵌资源的广度 ,“亲属成员数”代表嵌入在讨论网内的资源有多少来自亲属。“是否自雇”不显著 ,说明自雇或受雇的就业状态在这两方面都没有差异。从控制变量分析结果看 ,父亲是大学及以上的教育程度者比父亲是小学文化程度的个体在讨论网规模方面更为广泛 ,男性讨论网的规模比女性小 ,年龄越大讨论网规模反而越小 ,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则讨论网规模越大。从亲属人数看 ,男性同样没有女性多 ,已婚人士比未婚人士的讨论网里有更多的亲友数。

“网络密度”、“年龄异质性”、“教育异质性”、“性别异质性”都是连续型变量 ,本研究采用线性回归分析。表 3 的结果显示 ,“是否自雇”对这四个变量的影响都不显著 ($P = 0.109 , 0.496 , 0.629 , 0.955$)。由此 ,假设 1 得到证实。个人的自雇或受雇的就业身份在他们的讨论网社会资本的建构中没有显著差异。

网络密度以及其他三个异质性指标 ,其实都是通过测量讨论网的特征而间接了解资源在网络内的异质性状况。异质性越高 ,则资源种类越丰富。但恰如本研究所认为的 ,讨论网内嵌的资源更多是用来实现表意性的功能 ,比如情感倾诉、重大问题解决 ,自雇者和受雇者在维

表2 “是否自雇”分别对“讨论网规模”和“亲属成员数”的泊松回归系数

变量	(1) 讨论网规模	(2) 亲属成员数
父亲教育(参照组:小学及以下)		
中学	.058 (.055)	.078 (.068)
大学及以上	.112* (.059)	.061 (.072)
性别(男性)	-.119*** (.045)	-.139** (.056)
移民	.069 (.054)	.054 (.068)
年龄	-.008*** (.003)	-.006 (.004)
年龄二次项	.000 (.000)	.000 (.000)
已婚	-.002 (.071)	.347*** (.092)
社会经济地位指标	.064*** (.024)	-.007 (.031)
政治资本(党员)	.090 (.061)	.021 (.076)
政治地位(干部)	.074 (.066)	.109 (.082)
是否自雇	.073 (.080)	.126 (.094)
常量	.726*** (.083)	.071 (.106)
样本数	933	933
似然比对数(Log likelihood)	-1587.5	-1389.0
伪决定系数(Pseudo R-squared)	.02	.02

注:(1)括号中为回归系数的标准误;(2)* p<0.10,**p<0.05,***p<0.01。

持和构建讨论网上不应有太大差异,数据结果也证实了这种分析。

但从其他因素来看,(1)网络密度受到父亲教育程度和个体自身年龄的影响,父亲是大学文化程度的人比父亲是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具有更低的网络密度,相对来说网络更为松散。年龄越大则网络密度也越高。网络密度还受到政治地位的影响,干部人员比非干部人员的网

表 3 “是否自雇”对其他四个讨论网社会资本指标的回归分析

变量	网络密度	年龄异质性	教育异质性	性别异质性
父亲教育(参照组:小学及以下)				
中学	-.025 (.031)	-.891 (.819)	-.320 (.280)	.035 (.040)
大学及以上	-.068** (.033)	-.197 (.872)	-.372 (.300)	.041 (.042)
性别(男性)	-.012 (.025)	-.773 (.663)	.071 (.227)	-.026 (.033)
移民	-.001 (.030)	-1.081 (.793)	.172 (.272)	.010 (.039)
年龄	.005*** (.002)	.088** (.045)	-.013 (.015)	-.006*** (.002)
年龄二次项	.000 (.000)	.005** (.002)	.001 (.001)	.000 (.000)
已婚	.045 (.040)	.532 (1.058)	.631* (.362)	.118** (.053)
社会经济地位指标(SES)	-.014 (.014)	-.001 (.362)	-.043 (.124)	.035* (.018)
政治资本(党员)	-.033 (.035)	1.967** (.918)	.208 (.314)	.015 (.046)
政治地位(干部)	-.073* (.037)	-1.262 (.993)	-.534 (.340)	.023 (.049)
是否自雇	.070 (.043)	.783 (1.148)	-.190 (.392)	.003 (.057)
常量	.658*** (.047)	11.140*** (1.244)	2.321*** (.427)	.339*** (.061)
样本数	626	622	616	856
似然比对数	.10	.08	.02	.03
伪决定系数	.09	.06	.00	.02

注:(1) 括号中为回归系数的标准误差;(2) * p < 0.10 , **p < 0.05 , ***p < 0.01 。

络密度要小。(2) 年龄异质性受到政治资本的影响,党员讨论网成员的年龄层次比非党员更多样;同时,年龄越大,网络内的年龄层次也越丰富,但到一定阶段后,网络人员的年龄层次开始下降。(3) 教育异质

性受到婚姻状态的影响,与未婚人士相比,已婚人士的讨论网里嵌入的教育资源更多样化。(4) 性别异质性也受到婚姻的影响,与未婚人士相比,已婚人士讨论网的性别差异更大,这与一贯的经验研究结果比较吻合。社会经济水平高,也更倾向与不同性别的人接触;此外,此指标还受到年龄的负向影响。

(二) “拜年网社会资本”受到“是否自雇”影响。差异性主要体现在拜年对象的职业广度和拜年对象的职业差距等两个维度上。与受雇者相比,自雇者的拜年网内有更多代表不同层次资源的职业类型,且职业资源的差异更大。

由于拜年人数是计数变量,且存在过离散现象(方差远大于均值,三个模型的 alpha 似然比检验显著,均小于 0.05),本研究采用负二项模型(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分析。表 4 的分析结果显示,拜年人员构成中的亲属人数、好朋友数、一般朋友/相识者的人数都未因个体就业状态的不同而有差别。因此,无论自雇还是受雇于他人,拜年网的亲属人数、好朋友数、相识者人数都无显著差别。“嵌套模型”似然比检验亦不显著,分别为 0.928、0.382、0.353。

前文已谈及,拜年网的人员构成表明了拜年网中资源的来源情况。从控制变量看,(1) 拜年网中来自亲属的资源受到父亲文化程度的积极影响。通过计算发生率之比(incidence rate ratio, irr)变化的百分比(见表 4)(王存同,2010),可以发现,与父亲是小学文化的人相比,父亲是中学文化的人的亲属人数增加一个人的发生比是 1.22,即增加了 22.1%,父亲是大学文化的人增加了 20.2%;此外,拜年网中的亲属人数还受到移民身份、年龄和社会经济地位正向影响。(2) 好朋友人数受到年龄影响,年龄在平均水平上每增加一岁,好朋友人数反而减少 1.3%,不过,社会经济地位对好朋友人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3) 有趣的是,对于关系更为疏松的相识者的人数,受到社会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的影响。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则拜年网中纳入的相识人数越多。干部比非干部的拜年网中有更多的相识者。

研究结果还显示(见表 5),“是否自雇”对网顶无影响,但对网络广度和网距存在显著影响。前者不显著说明自雇者和受雇者可以达到的最高资源没有差异。网络广度显著,在控制其他变量后,自雇者比受雇者可多接触到 0.87 个职业,这也说明自雇者的职业网络里嵌藏着更

表 4 “是否自雇”对拜年网各构成人数负二项模型分析的发生比变化百分比

变量	亲属人数	好朋友人数	相识者人数
父亲教育(参照组:小学及以下)			
中学	22.1 ***	-5.8	-15.2
大学及以上	20.2 **	-9.2	-25.2
性别(男性)	5.1	-4.6	-.6
移民	16.3 **	10.1	-29.6
年龄	-1.0 **	-1.3 **	-1.4
年龄二次项	.0	.1	.1*
已婚	31.0 ***	10.2	22.6
社会经济地位指标(SES)	15.4 ***	10.9 **	28.9 ***
政治资本(党员)	-3.8	10.7	5.5
政治地位(干部)	-7.6	10.9	15.5*
是否自雇	-.9	13.5	27.0
样本数	911	900	889
似然比对数	-2881.12	-2878.20	-2374.5
伪决定系数	.012	.001	.001

注:(1)标题中所指百分比是指自变量增加一个单位会引起期望计数因变量变化的百分比;(2)* p < 0.10, **p < 0.05, ***p < 0.01。

多的不同等级的资源;此外,不同就业状态下有不同的网距,自雇者网络资源的等级差异比受雇者大了9.22个职业声望分,表明自雇者比受雇者的网络资源的差异更大,这更有助于实现不同的行为目标。

不过,对模型标准化分析后,结合其他控制变量的情况可发现:对网络广度影响最大的是社会经济地位,在控制其他变量后,每增加一个单位的社会经济地位,网络广度会增加0.22个标准差;其次是性别(男性比女性多增加0.08个标准差)、父亲的教育(大学文化、中学文化都比小学文化多0.07个标准差);随后才是就业状况,自雇比受雇可以令网络广度增加0.06个标准差。而将各因素对网距的影响做标准化分析后,排序发现,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年龄,就业状况排在第三。换言之,虽然在众因素中就业状况对这些指标的影响并非最大,但仍不可忽视。至此,研究假设2部分地得到证实。

表 5 “是否自雇”对拜年网内职业资源的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网络广度	网顶	网距
父亲教育(参照组:小学及以下)			
中学	.590* (.310)	1.868 (1.826)	1.257 (2.511)
大学及以上	.635* (.329)	3.572* (1.948)	3.772 (2.680)
性别(男性)	.647** (.253)	.077 (1.489)	4.863** (2.047)
移民	.386 (.310)	-.150 (1.830)	2.609 (2.517)
年龄	-.004 (.017)	-.130 (.103)	-.204 (.141)
年龄二次项	-.001 (.001)	.000 (.005)	-.002 (.007)
已婚	.482 (.413)	-.346 (2.443)	.488 (3.360)
社会经济地位指标(SES)	.853*** (.144)	7.953*** (.848)	3.001** (1.166)
政治资本(党员)	-.041 (.352)	1.805 (2.046)	-.886 (2.814)
政治地位(干部)	.382 (.386)	4.235* (2.228)	-4.395 (3.064)
是否自雇	.871* (.456)	2.331 (2.714)	9.218** (3.732)
常量	3.909*** (.467)	72.656*** (2.763)	47.671*** (3.800)
样本数	933	865	865
似然比对数	.09	.17	.05
伪决定系数	.08	.16	.04

注:(1) 括号中为回归系数的标准误;(2) * p<0.10 ,**p<0.05 ,***p<0.01。

(三) 饭局网社会资本非常明显地受到就业状态的影响。自雇者比受雇者投资了更丰富的饭局网社会资本,但这种影响只在参加饭局非常频繁时才有所体现。亦即,自雇者比受雇者投入了更多时间和精力去维持或建构饭局网。

由于因变量主要测量的是饭局频度,属定序变量(取值为“很少”、

“一般”、“经常”等三个层次)需用序数逻辑斯谛回归(Ordinal Logistic Regression)模型分析。但因平行回归假设(parallel regression assumption or proportional odds assumption)检验显著,此处使用广义序数逻辑斯谛回归(Generalized Ordinal Logistic Regression)分析模型更为恰当。这个模型既考虑到了因变量是定序变量,又放松了平行回归假设限制。将控制变量模型与加入自变量后做嵌套模型似然比检验,“是否自雇”对请人吃饭、被请吃饭和陪吃饭等三种网络的影响都很显著(嵌套显著检验分别为 0.021 ρ .037 ρ .034)。

表 6 列出了“是否自雇”对饭局网社会资本的广义序数逻辑斯谛回归分析的系数。以“请人吃饭频率”为因变量的两个子模型中,在控制其他变量后,“是否自雇”在两个子模型中对因变量的影响不相同,只在“经常”请人吃饭与“一般或较少”请人吃饭的发生比上显著。其回归系数(0.961)统计显著($P=0.005$),在一定程度上这说明自我创业者比受雇者更倾向于高频度地请他人吃饭。通过计算风险发生比的比率($OR=2.62$),可知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自我创业者经常请他人吃饭的频率是受雇者的 2.62 倍,即提高了 162%。

同样,在“被人请吃饭频率”为因变量的两个子模型中,也只在“经常”与“很少和一般”被请吃饭的发生比比率上,统计检验才显著($P=0.007$),回归系数 0.846。风险比比率值计算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自雇者是受雇者的 2.33 倍(即提高了 133%)。这说明两种不同的就业状态对高频率的被人请吃饭的网络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是否自雇”对“陪人吃饭”网络强度的影响也是在高频率层次才显著($P=0.008$)。在“经常”陪人吃饭与“很少和一般”的低频率陪人吃饭的发生比比率上,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自雇者是受雇者的 2.32 倍(即提高了 132%)。同样,“一般和经常”陪人吃饭对比“很少”陪人吃饭的发生比比值没有受到显著影响。

由此可见,受雇者与自雇者的饭局网社会资本在高频率的构建活动上存在很大差异。换句话说,在一般强度的饭局活动和网络建构上,自雇者与受雇者差异不大,但自雇者倾向于更高频率地构建或动用饭局网社会资本。由此,假设 3 得到证实。

此外,从控制变量情况可以发现,对饭局网社会资本有显著影响的指标还有性别、年龄、社会经济地位以及政治地位。

表 6 “是否自雇”对饭局网社会资本三个维度的广义序数逻辑斯谛回归分析

变量	请人吃饭频率		被人请吃饭频率		陪人吃饭频率	
	经常和一般 vs. 很少	经常 vs. 一般和很少	经常和一般 vs. 很少	经常 vs. 一般和很少	经常和一般 vs. 很少	经常 vs. 一般和很少
父亲教育(参照组:小学及以下)						
中学	.094 (.184)	-.028 (.277)	.134 (.184)	-.025 (.248)	.208 (.182)	-.125 (.255)
大学及以上	.054 (.196)	-.360 (.328)	-.109 (.192)	-.569* (.309)	.056 (.191)	.030 (.289)
性别(男性)	.236 (.150)	.745*** (.239)	.144 (.150)	.475** (.210)	.094 (.149)	.672*** (.217)
移民	-.128 (.186)	-.254 (.264)	-.374* (.195)	-.370 (.239)	-.310 (.189)	-.238 (.242)
年龄	-.044*** (.011)	-.052*** (.017)	-.037*** (.011)	-.048*** (.014)	-.033*** (.011)	-.060*** (.014)
年龄二次项	-.000 (.001)	-.002 (.001)	.000 (.001)	.001 (.001)	.000 (.001)	.001 (.001)
已婚	.232 (.252)	.145 (.345)	-.090 (.253)	.171 (.309)	-.558** (.250)	-.059 (.315)
社会经济地位指标 (SES)	.707*** (.105)	.380*** (.110)	.595*** (.105)	.359*** (.103)	.386*** (.095)	.089 (.116)
政治资本(党员)	-.112 (.220)	.012 (.313)	-.281 (.217)	-.021 (.286)	-.128 (.213)	.027 (.295)
政治地位(干部)	.603** (.248)	.452 (.319)	.511** (.252)	.007 (.310)	.710*** (.248)	.454 (.312)
是否自雇	.383 (.270)	.961*** (.339)	.187 (.265)	.846*** (.316)	.083 (.261)	.843*** (.319)
常量	-.137 (.281)	-2.710*** (.468)	.571** (.279)	-2.430*** (.395)	.697** (.279)	-2.698*** (.405)
样本数	929		929		925	
似然比对数	-769.5		-822.7		-818.9	
伪决定系数	.13		.10		.10	

注:(1) 括号中为广义序数逻辑斯谛回归系数的标准误;(2) * p < 0.10 , **p < 0.05 , ***p < 0.01。

七、总结与讨论

本研究主要有两个研究目的。第一,理清社会资本概念以及区分三种不同的社会资本测量工具,并提出社会资本多维度理论假说。由于社会资本概念存有争议,导致当前对社会资本的测量也存在认识不清的现象。本研究在陈述两类主要的社会资本概念后,分析了两类概念的异同,着重指出要理解社会资本,必须同时考虑网络特征和内嵌的社会资源。网络特征会影响自身承载的社会资源量,但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后者。由此,本研究对三种测量工具的设计内涵作了剖析,指出无论定名法、定位法,还是饭局网测量,其最终的测量指向都是网络内的资源情况。其实,这也是社会资本理论暗含的统一性和生命力。

本研究提出,由于设计理念和测量情境的差异,不同测量工具各有所长,测得的社会资本在功能和构成上会有所不同,它们构成了社会资本的不同维度。这种多维度社会资本理论假说有待进一步研究证明,但可解释社会资本的复杂性以及它之所以能够帮助认识社会行动/社会结构的根由。因此,在能够明确区分测量情境和研究主题性质的前提下,研究者可以选择恰当的测量工具和社会资本维度。具体来讲,当研究主题与表意性活动有关时,可选用定名法,而围绕工具性行为的研究话题则可考虑使用定位法。不过,当研究主题性质并不明显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时,有效的做法是将三个测量工具下的社会资本维度都纳入研究内,以避免得出偏颇之论。当前有关社会资本的研究中,对同一研究主题得出相左结论时,没有综合考虑社会资本维度或者误用了社会资本测量工具可能是原因之一。

此外,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和社会风俗下测量社会资本时,还需要设计或修正出相适应的工具来测量。比如,饭局网社会资本测量工具是依据中国情境设计的,主要测量中国日常人际往来中较常出现的三种饮食社交方式,其发生强度越高则个体维系、构建或从中可借用的网络资源就越可能成功。定名法与定位法这两种测量方法经过多方测试,较为常用。尤其是定位法,可以捕捉到人际网络中较为普适的网络结构特征和社会资源情况。但当具体到地方性研究时,若有符合本土社会活动内涵的测量工具予以补充,则能更好测量并研究社会资本。

第二,本研究尝试对布劳和邓肯的地位获得模型进行有关社会资

本生成分析的补充。在对当前社会做了三个假定(即社会职位存在等级,人有先赋资源和自致资源,社会开放且允许自由流动)后,布劳和邓肯进而分析提出个体的地位获得更多受到自致资源的影响。此模型从获得方式入手解释了两类资源在地位获得中的作用,但忽视了非正式网络资源在其中的作用(Lin,1999)。为此,社会资本方面的研究传统将社会资本作为中介变量引入了模型,发现先赋资源和个人的初职经历会通过社会资本对个人当前地位获得发生影响。社会资本的加入为地位获得模型增加了更多的解释力,但问题在于:社会资本如何在此模型内生性的研究关注还并不多。尤其是对不同的就业状态(自雇和受雇),作为个体进入劳动力市场后的最大的特征变化之一,对当前的社会资本生成的影响分析非常鲜见。此外,当前的劳动力市场研究往往仅将社会资本作为外生变量引入,并集中关注它对相关劳动力市场现象有什么样的影响。但当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劳动力竞争、市场分配等活动会改变参与者的身份、行为方式,进而影响他们的资源和人际交往。本研究提出,劳动力市场的各种现象不仅仅受到社会资本影响,同时也对社会资本的生成有不同的影响。为此,本研究认为有必要考察当前的不同维度社会资本的生成是否会受到不同就业状态的影响,以补充布劳和邓肯的地位获得模型。

数据分析显示,对于讨论网社会资本,不同就业状态对它的影响并不显著。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受雇者和自雇者的讨论网社会资源并没有不同。但对于拜年网社会资本,“是否自雇”对“网络广度”、“网络差距”两个指标有显著影响。说明在拜年网络中,自雇者比受雇者有更多的代表不同等级资源的职业类型,自雇者建构的拜年网覆盖了不同等级的社会资源。此外,受雇人员的资源差距不如自雇人员的大,说明自雇者纵向接触的社会阶层更为多样,其拜年网内嵌藏的资源更为丰富多样。最后,“是否自雇”对饭局网社会资本的三个指标都有显著影响。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对于饭局网社会资本的三个维度,“自雇”和“受雇”两个群体在各指标的风险发生比上均有显著的差异。自雇者比受雇者更频繁地参与到各种饭局活动中,也更容易通过较高频率的饭局活动来维系、扩大其社交网络并积累丰富的社会资本。

可见,自雇者与受雇者在表意性社会资本上不存在差异,但自雇者

能更多地去投资、构建并拥有更丰富的工具性资本。^①换言之,自雇者比受雇者更需要工具性社会资本(“结构性约束”)或者说在构建和维持工具性社会资本上更具有主动性(“选择性约束”)。至于具体是哪一种情况,或是两种情况都有,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证明。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提出,信息不完全是造成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原因之一(Cain,1976)。自雇者比受雇者倾向去投资建构并拥有更多的工具性社会资本,意味着前者比后者能触及到更多的有利工具行为的信息。不过,本研究中有数据分析显示,67.9%的自雇者同意“有的关系起作用,但不起决定性作用”,说明关系在自雇者的事业经营中不可缺少,但自雇并非仅靠关系就能获得成功。在社会资本发生回报作用的同时,个体还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且在某些情境下,其他因素对个体的帮助可能要大于社会资本的作用(赵延东、风笑天,2000)。比如,倪志伟和桑德斯(Nee & Sanders,2001)发现,当教育程度低且存款较少时,移民倾向去寻找族裔群体的帮助以实现就业,相反,高教育程度且有丰富存款的移民更多依靠自身的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实现就业并融入主流文化,社会资本只起辅助作用。那么,对于自雇者,在社会资本起作用的同时,还有其他哪些因素起作用,需要进一步研究分析。^②

在中国,有关自雇人数的全国范围内的具体统计数据有待完善(赵红,2007),但有研究发现此类群体规模呈上升趋势,从1989年的140万增长到1998年的6110万(Lu et al.,2002),尤其近年全国各地提出的“鼓励自主创业政策”正在加速这个群体的发展。如何认识这个群体并恰当地制定与这个群体相关的政策变得非常重要。本研究以受雇群体为参照,对比了自雇群体与受雇群体在劳动力市场内的社会资本生成差异,为了解自雇者的社会流动起到些许补充作用,也为相关政策决策者提供了更丰富的决策参考。

① 社会资本的生成不仅受到就业状态的影响,文中发现有时其他因素的作用还要大于就业状态,但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就业状态仍然显著。这一结果说明,不能忽视不同就业状态对社会资本生成的作用。此外,数据中就业状态形成时间先于社会资本的测量时间,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就业状态能对社会资本产生影响。不过,由于本文使用的是横贯数据,其因果关系证明上的局限性使得本文无法很有力地证明存在“职业差异导致社会资本差异”的因果关系。期待以后进一步研究以证之。感谢匿名评审关于此点的建议。

② 感谢匿名评审老师提出要增加有关此点解释的建议。

参考文献:

- 边燕杰 2004,《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来源及作用:网络观点与调查发现》,《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
- 边燕杰、刘翠霞、林聚任 2004,《中国城市中的关系资本与饮食社交:理论模型与经验分析》,《开放时代》第2期。
- 边燕杰、丘海雄 2000,《企业的社会资本及其功效》,《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
- 郭毅、朱熹 2002,《企业家的社会资本——对企业家研究的深化》,《外国经济与管理》第1期。
- 马丽媛 2010,《企业家社会资本的测量及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基于新兴第三产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南方经济》第5期。
- 梁玉成 2010,《社会资本和社会网无用吗》,《社会学研究》第5期。
- 罗家德 2005,《社会网分析讲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林南、敖丹 2010,《社会资本之长臂:日常交流获取工作信息对地位获得的影响》,《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
- 王存同 2010,《零膨胀模型在社会学实证研究中的应用——以中国人工流产影响因素的分析为例》,《社会学研究》第5期。
- 谢宇 2010,《回归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张文宏、李沛良、阮丹青 2004,《城市居民社会网络的阶层构成》,《社会学研究》第6期。
- 赵红 2007,《国家统计局参加 OECD 数据发布计划进展情况》(<http://www.oecd.org/dataoecd/55/32/39178761.pdf>)。
- 赵延东、风笑天 2000,《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下岗职工的再就业》,《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第2期。
- 赵延东、罗家德 2005,《如何测量社会资本:一个经验研究综述》,《国外社会科学》第2期。
- Ajrouch, K. J., A. Y. Blandon & T. C. Antonucci 2005, "Social Networks among Men and Women: The Effects of Age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 *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60(6).
- Barbieri, P. 2003, "Social Capital and Self-employment."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18(4).
- Bian, Y. & Lulu Li 2005, "China's General Social Survey 2003 (CGSS2003): A Methodological Repor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Proceedings of JGSS Colloquium 2005.
- Blau, P. M. & O. D. Duncan 1967,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New York: Wiley.
- Bourdieu, P. 1986,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J. G. Richardson (ed.),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 Boyd, R. L. 2005, "The Reemergence of Self-Employment: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elf-Employment Dynamics and Social Inequality." *Contemporary Sociology: A Journal of Reviews* 34(6).
- Burt, R. S. 1995, *Structural Hole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98, "The Gender of Social Capital." *Rationality and Society* 10(1).
- 2000, "The Network Structure of Social Capital."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2.
- Cain, G. G. 1976, "The Challenge of Segmented Labor Market Theories to Orthodox Theory: A

- Surve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4(4).
- Carrington, W. J., K. McCue & B. Pierce 1996, "The Role of Employer/Employee Interactions in Labor Market Cycles: Evidence from the Self-employed."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14(4).
- Chung, L. 2008, "Parental Closure Effects on Learning: Coleman's Theory of Social Capital on Learning Revised." In R. Hsung, N. Lin & R. Breiger (eds.), *Contexts of Social Capital: Social Networks in Communities, Markets and Organiz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 Coleman, J. S. 1986, "Social Theory, Social Research, and A Theory of Ac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6).
- Erickson, B. H. 1996, "Culture, Class, and Connec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2(1).
- Fernandez, R. M., E. J. Castilla & P. Moore 2000, "Social Capital at Work: Networks and Employment at a Phone Center."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5(5).
- Granovetter, M. S. 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6).
- Hundley, G. 2001, "Why and When Are the Self Employed More Satisfied with Their Work?" *Industrial Relations: A Journal of Economy and Society* 40(2).
- Lee, R. P. L., D. Ruan & G. Lai 2005, "Social Structure and Support Networks in Beijing and Hong Kong." *Social Networks* 27(3).
- Liao, J. & H. Welsch 2003, "Social Capital and Entrepreneurial Growth Aspiration: A Comparison of Technology- and Non-technology-based Nascent Entrepreneurs." *The Journal of High Technology Management Research* 14(1).
- Lin, N. 1989, "Chinese Family Structure and Chinese Society."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65.
- 1999, "Social Networks and Status Attainmen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5.
- 2001, *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05, "A Network Theory of Social Capital." In D. Castiglione, J. V. Deth & G. Wolleb (eds.), *Handbook of Social Capital*.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in, N., D. Ao & Lijun Song 2009, "Production and Return of Social Capital: Evidence from Urban China." In R. Hsung, N. Lin & R. Breiger (eds.), *Contexts of Social Capital: Social Networks in Communities, Markets and Organiz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 Lin, N., Y. Fu & R. M. Hsung 2001, "The Position Generator: Measurement Techniques for Investigations of Social Capital." In N. Lin, K. S. Cook & R. S. Burt (eds.), *Social Capital: Theory and Research*.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 Lin, N., P. Dayton & P. Greenwald 1978, "Analyzing the Instrumental Use of Rel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 Structure." *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Research* 7(2).
- Lin, N. & M. Dumin 1986, "Access to Occupations through Social Ties." *Social Networks* 8(4).
- Lu, M., J. Fan, S. Liu & Y. Yan 2002, "Employment Restructuring during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 *Monthly Labor Review* 125(8).
- Marsden, P. V. 1987, "Core Discussion Networks of America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2

(1) .

- Muehlberger ,U. 2001, “Dependent Self-employment: Workers on the Border between Employment and Self-employment. ” *Theory and Society* 20(2) .
- Nee ,V. & J. Sanders 2001, “Trust in Ethnic Ties: Social Capital and Immigrants. ” In K. S. Cook (ed.) ,*Trust in Society*.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Portes ,A. 1998, “Social Capital: Its Origins and Applications in Modern Sociology. ”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4(1) .
- Putnam ,R. D. 2000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Stoneman ,P. & B. Anderson 2006, “Social Capital , Quality of Life , Employment and ICTs. ” *Chimera Working Paper* 4.
- Taylor ,M. P. 1996, “Earnings ,Independence or Unemployment: Why Become Self Employed?”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58(2) .
- Van der Gaag ,M. ,T. A. B. Snijders & H. D. Flap 2008, “Position Generator Measure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o Other Social Capital Measures. ” In N. Lin & B. Erickson (eds.) ,*Social Capital: An International Research Progra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Veenstra ,G. 2000, “Social Capital ,SES and Health: An Individual-level Analysis. ”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50(5) .
- Volker ,B. & H. Flap 2003, “Social Networks and Performance at Work: A Study of the Returns of Social Capital in Doing One’s Job. ” In H. Flap & B. Volker (eds.) ,*Creation and Returns of Social Capital: A New Research Program*. London: Routledge.
- Yueh ,L. 2009, “China’s Entrepreneurs. ” *World Development* 37(4) .

作者单位: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 杨 可

have better understanding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networks and labor market outcomes.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identifies three types of job seekers according to the channels of getting their first jobs: (1) workers used formal (non-network) channels only (Type I) ; (2) workers used both formal and network channels (Type II) ; and (3) worker used network channel only (Type III) . Analyzing data from the “Survey of Social Networks and Occupational Experiences in Chinese Cities in 2009” (JSNET 2009) ,the author finds that these three types of workers differ greatly in socioeconomic status , network resources , and labor market experiences.

Fertility Decline and the Trend in Educational Gender Inequality in China *Ye Hua & Wu Xiaogang* 153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ffects of sibship size and configurations on educational gender inequality in the context of fertility decline in China since the late 1970s. Fertility decline reduces sibship size and changes sibship configurations and thus bear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family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and educational gender inequality. Analyses of the data from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 2006) show that , in terms of years of schooling , women are more disadvantaged in families with more siblings , especially when they have brothers. Educational gender inequality is less severe for younger cohorts than for older cohorts due to fertility decline in China. The research demonstrates that educational gender inequality is affected not only by gender egalitarian policies but also influenced by policies designed to induce fertility decline.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Paranormal Beliefs in Contemporary China:
Exploring how to define Chinese religions
..... *Xia Changqi & Wang Cuntong* 178

Abstract: Using the 2007 Empirical Survey of Values in China ESVIC , the authors conducted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paranormal beliefs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authors find that the types of paranormal beliefs in China are various ,but not prevailing. Chinese paranormal beliefs a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rrelated with variables such as age , marital status , education level , and health condition. Those who are older , married , less educated , and have self-rating bad health are more likely to practice paranormal beliefs ,but the social correlations are complicated. They are different among types of paranormal belief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anormal beliefs and religious beliefs ,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religious believers are more likely to have some paranormal beliefs than non-believers. At the end , the authors explored how to define Chinese Religions.

A Study of the Social Capital Differential between the Self-employed and

Abstract: When analyzing the roles and effects of social capital in the processes of status attainment , it is essential to solve two puzzles. The first is about the conceptualization and measurement of social capital , and the second is to examine whether employment status (e. g. , the self-employed vs. the employed) has an effect on the creation of social capital measured by different instruments. This research reckons that the existing measuring instruments differ in terms of designing principles and functions and researchers need to adjust and adopt appropriate instrument based on research goals and measurement contexts. In addition , with three dimensions of social capital measured by different instruments , this study tries to examine whether there is a differential in social capital between the self-employed and the employed using the Job Searching and Network in Urban China (Guangzhou 2009) data. Results show that , first of all ,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ccess to social capital embedded in core discussion network between the self-employed and the employed. Second , compared with the employed , the self-employment are more likely to invest and enjoy more social capital embedded in New Year greeting network and in social eating network.

REVIEW

Abstract: The new economic sociologists argue that prices are shaped by social networks , prices are socially constructed , prices are made following existing pricing schemes in a given industry , and prices have multiple meanings. Due to the segmentation of the new economic sociology’s various theoretical schools , these arguments on price have not been integrated into a single coherent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e price views of social constructionism and neo-institutionalism in the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are helpful for us to study the future prices of commodities and the diffusion of pricing schemes in emerging industries. The price view of cultural sociology argues that price not only signals a commodity’s quality but also represents certain social features of the actors relevant to the commodity , which is especially relevant to the pricing of consumer products such as fashion and luxurious goods , and the pricing of artistic works and the so called “priceless” goods. The structural economic sociology has an intensive dialogue with economics , focusing on trust and reciprocal expectations as governance arrangement , information distribution and dissemination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determination of production cost and transaction cost. The price views of various new economic sociology theories , while different from their counterparts in economics , share some common features: they all focus on the social factors shaping price volatilities and seek to modify and improve the price theories of economics.